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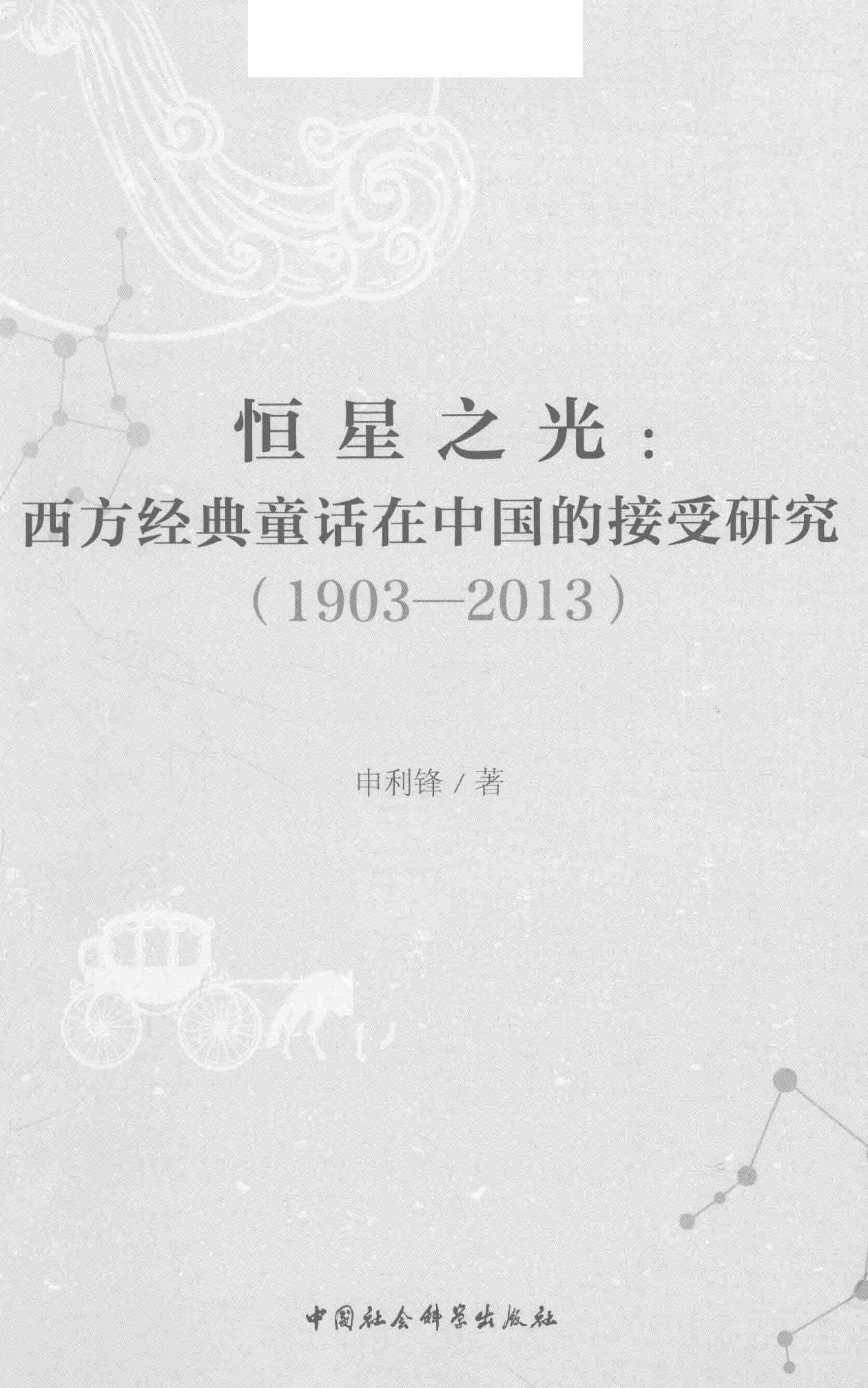
恒星之光：

西方经典童话在中国的接受研究
(1903—2013)

申利锋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恒星之光： 西方经典童话在中国的接受研究 (1903—2013)

申利锋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恒星之光：西方经典童话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03—2013 / 申利锋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4

ISBN 978 - 7 - 5203 - 4226 - 1

I. ①恒… II. ①申… III. ①童话—文学史—研究—世界—1903 - 2013
IV. ①I106.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864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李斌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276 千字

定 价 8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YJC751032）成果
湖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序

十一

申利锋是我在 2009 年招收的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她读硕士时的专业是文艺学，考博时出于个人兴趣想改读中国民间文学。据我了解，她自 1995 年就读华中师大中文系以来，一直积极向上，勤奋好学，是师生们一致公认的认真、踏实的学生，所以我就欣然同意了她的申请。令人欣慰的是，申利锋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我的门下，并于 2013 年底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毕业后，她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并获得批准；现在，她完成了对书稿的修订，并托我来给她作序。看到自己的学生一直在学术的道路上保持努力，有进步、有成长，我从内心感到高兴，愿意来谈谈我对本书的一些看法。

众所周知，儿童文学研究和童话研究惯被视为“小儿科”，在我们的学术体系中一直是一个相对薄弱、不太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国内高校也很少给它一个独立门户的学科位置，当前在儿童文学研究方面较有成就的主要集中在北师大、浙江师大、上海师大、中国海洋大学、沈阳师大、温州师范学院等少数几所高校，当下的儿童文学研究也主要只有王泉根、方卫平、梅子涵、朱自强、马力、吴其南等少数几位领军人物，现今几乎没有关于儿童文学研究的专门期刊……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诸种冷寂现状，跟国内其他人文学科研究队伍的庞大、研究成果的繁多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追忆往昔，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们华中师大中文系曾在浙师大蒋风老师的牵头下，与浙江师大、北师大的中文系老师们一起编写过《儿童文学教程》等教材，我们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刘守

华先生在 80 年代中期还出版过《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一著；但后来，华师并未能把儿童文学研究、童话研究持续下去，这是令人颇感遗憾的。虽然这些年来，我们有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专业的学生撰写过一些儿童文学研究方面的学位论文，但我校文学院迄今为止也没有过儿童文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招生，这同样是令人引为憾事的。

所以，当申利锋告诉我她想写有关童话研究方面的论文时，我感到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们的学生中依然不断有人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研究感兴趣，如此一来，这些年轻的力量就能够有机会为该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担心的是，我拿不准对于童话研究这个实际上有着高难度和高标准要求的领域，申利锋是否有足够的学术能力完成她的博士论文。后来，经过与我的多次讨论，申利锋最终把她的论文题目确定为“西方经典童话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我认为这个选题符合她踏实、认真的为人和为学的个性，也坚信她能够把这个课题完成好。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申利锋是为她的这份研究下了一番苦功夫的，因为这本书稿中涉及了西方童话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过程中的大量资料，涉及的时间跨度也很长，而且作者在爬梳资料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提炼观点、总结规律，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静坐冷板凳的耐心与毅力，这个研究任务是很难完成好的。

学术研究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强调要对研究对象沿波讨源，以辨明问题的由来与发展脉络，并探究其纷繁表象背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中国艺术童话的发展固然有深厚的民间故事的基础，但毋庸讳言的是，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自觉、“童话”概念在中国的出现以及与之相伴的“儿童观”的传播等，都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都与西方经典童话在中国的接受息息相关。因此，本书将“西方童话文体的独立和经典作品的生成”作为首章，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在此章中，作者较为细致地梳理了西方自文艺复兴至 19 世纪中叶，艺术童话逐步从民间童话中独立出来并获得完备内涵的历程。而所谓完备的内涵，主要是指儿

童本位的创作观念在欧洲逐步得到确认；在这一过程中，童话文体的雅化、“为儿童写作”观念的强化、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的经典化，等等，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时至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童话创作的中心转移到英国，以金斯莱、卡洛尔、王尔德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童话作家大量涌现，他们共同开创了西方童话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终使童话跻身于主流的文学园地，并带动了欧洲及世界各国艺术童话的创作。由此可见，即使是在西方，童话文体的独立和童话观念的深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前后经历了 5 个多世纪之久，其中的教训和启示是相当丰富的。因此，要想在有限的篇幅中厘清西方童话从发生到初步经典化过程的脉络，没有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分析归纳能力，是很难做到的。但作者能紧扣“儿童观”这一中心，从名与实、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上展开论述，要言不烦，思路和观点都相当明晰，这是殊为不易的。应该说，这为后文的展开确立了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

本书的主体部分是梳理西方经典童话进入中国以来一波三折的历程及其产生的影响，辨析中西童话观念和童话创作的异同，这实际上兼具学术史研究和文学比较研究的双重意义。在学术史研究的层面，作者把西方童话在中国的 110 年的接受史（1903—2013），划分为开创期（1903—1949）、曲折期（1949—1978）和繁盛期（1978—2013）三个阶段，主要结合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态的历时变迁，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学者和创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西方经典童话的译介、研究与借鉴的阶段性特征。这种学术史的梳理，如果没有适当的切入点的话，就很容易变成一本枯燥冗杂的流水账并损伤学术研究的魅力。但可喜的是，本书作者能够始终将“童话观”作为一条红线来串联各种材料，从而使全文的论述显得颇为紧凑和生动。以第二章为例，在论及“童话”概念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状况时，作者指出，在“五四”前后，中国学者对于“Fairy Tale”“Märchen”“童話”（来自日语）等词汇的理解各不相同，以致出现了“神怪小说”“滑稽小说”“寓言小说”等各种译名；在经过周作人、赵景深、张梓生等人的深入讨论后，才最终使

“童话”成为一个专门的中文学术名词。其中的关键因素，既有对“儿童本位”理论的体认，也包含着对民间童话、艺术童话等文体特征的辨析。而中国第一批现代童话作家，如陈衡哲、黎锦晖、赵景深、沈从文、叶圣陶等，他们的童话创作也都是基于对“童话”观念的理解展开的。这样的论述，其前后的关联性和主体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学比较研究的层面，本书作者既考察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童话创作所受西方童话的明显影响，同时也分辨了中国的艺术童话的独特性及其成因，体现了辩证、求是的学术品格。比如，在论述叶圣陶童话《稻草人》（集）的特点时，作者明确指出，叶圣陶童话在文体特征和抒情方式上，具有虚心向西方经典童话学习的明显特征，表现为优美隽永的语言、小儿一样说话的口吻、充满象征的人物和意境、变形夸张的情节、精致匀称的结构、诗意盎然的氛围等。但在表现社会苦难方面，与安徒生、王尔德、卡洛尔等作家的童话多以宗教作为终极关怀不同，叶圣陶的作品更为直面悲苦的现实，真切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与哀叹，“成人的悲哀”与“儿童的天真”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彼时中国风雨如磐的社会现实和“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作者认为：“恰恰是这种‘错位’，反而突显了叶圣陶童话与西方童话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突显了中国童话与西方童话的不同。”再如，在辨析中西“热闹派”童话的异同时，作者同样执著于探寻不同作品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其主要结论是：透过林格伦童话和郑渊洁童话的不同，再联系童话进入中国 110 年来的种种遭际，我们似乎能够发现这样一个规律：西方童话在整体上属于“浪漫”主义，始终贯穿着一条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红线，对儿童的礼赞往往就是对未来的热望；而中国童话在整体上属于“现实”主义，始终若隐若现地背负着一个“载道”的重任，对儿童的态度常常出于实用的讲求。二者的区别反映了中西童话观念和气质上的不同。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相当坚实和有说服力的。从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论述中能够看出，作者对自己选定的课题是非常肯下功

夫的，是能够认真阅读材料、辨析现象的，她对相关问题的阐释是合理的，对个别接受现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深度的。

本书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方面，是作者严谨细致的文风和态度，这既包括使用文献时的小心务实，也包括搜集和整理资料时的认真踏实。特别是，书中把西方的一些经典童话在 1918—1929 和 1930—1949 年间的中文翻译与出版情况，以及《木偶奇遇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作品在 1978—2013 年间的中文译本情况，以图表的形式予以呈现，既显得眉目清晰，又能充分展示西方童话在不同时期的中国均具有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其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这本书也有比较明显的瑕疵。比如，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作者主要是以中西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课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民间文学研究的方法，特别是比较故事学的研究方法，作者鲜有涉及，因而，当她在对中国的艺术童话进行分析时，不免忽略了中国民间幻想故事和中国民俗文化等对作家们创作童话的影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论题的研究维度和研究内容的缺失。又如，对核心概念的考辨与界定是进行课题研究的重要前提，但在本书作者对“童话”一词的界定还不够充分。另外，对于新时期的西方童话研究及中国本土童话理论的建设，也有待给予更全面、更细致、更深入的梳理。

人们常说“学无止境”，学术研究也是没有尽头的。我希望申利锋能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在她对儿童文学和童话的浓郁兴趣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并期待她在学术研究上能有更大的进步！

是为序。

黄永林

2018 年 10 月 30 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外来影响与中国童话的发展	(5)
第二节 20世纪以来中国西方童话研究述评	(23)
一 开创期(1903—1949):推崇与犹豫	(23)
二 曲折期(1949—1978):压缩与改造	(29)
三 繁盛期(1978—2013):拥抱与多元	(37)
第三节 关键概念与基本设想	(43)
第一章 风起西方: 西方童话文体的独立与经典	
童话的生成	(48)
第一节 从民间童话向艺术童话的演进	(49)
一 贝洛童话出现之前的缓慢进程	(51)
二 贝洛童话出现的背景与意义	(57)
第二节 “童话”文体的独立	(63)
一 “童话”(fairy tale)名称的出现及其意义	(65)
二 童话文体的发展与独立	(71)
第三节 西方经典童话的生成	(79)
一 黄金时代的璀璨群星	(81)
二 创作启示与历史意义	(87)
本章小结	(91)

第二章 西风东渐：“五四”前后对西方童话的拿来与选择	(92)
第一节 西方童话的“拿来”与知识界对“儿童”的发现.....	(94)
一 西方童话的“拿来”	(94)
二 西方童话与中国知识界对“儿童”的发现	(102)
第二节 逐渐清晰的“童话”概念.....	(109)
一 周作人、赵景深等人关于“童话”的讨论	(110)
二 “五四”前后的西方童话研究	(119)
第三节 西方童话与中国童话“自己创作的路”的开辟	(132)
一 西方童话与中国艺术童话的最初面貌	(133)
二 叶圣陶童话对西方童话的扬弃与新创	(140)
本章小结	(150)
第三章 中西碰撞：西方童话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152)
第一节 “鸟言兽语”之争的实质和余波	(154)
一 “鸟言兽语”之争及其实质	(154)
二 三四十年代关于西方童话的论辩	(162)
第二节 西方童话译介与研究的新特点	(168)
一 西方童话经典的巩固与扩展	(168)
二 三四十年代的西方童话研究	(178)
第三节 西方童话与张天翼、严文井等人的童话创作	(188)
一 借用：阿丽思和匹诺曹的中国行	(189)
二 化用：张天翼和严文井的中国风	(195)
本章小结	(203)
第四章 拥抱经典：新时期中西童话交融的喜与忧	(205)
第一节 西方童话译介的全面繁荣	(207)

一 西方童话翻译和出版的繁荣景象	(207)
二 新时期西方童话译介的亮点与影响	(221)
第二节 西方童话研究的新意与不足	(228)
一 西方童话研究的主要收获	(228)
二 童话批评理论的建构亟待加强	(236)
第三节 中西“热闹派”童话的联系与区别	(241)
一 游戏精神与顽童形象的相似	(241)
二 创作思想与童话观念的不同	(245)
本章小结	(247)
结语 向童话致敬，向经典致敬	(249)
参考文献	(253)
附录一 国际“安徒生奖”(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获奖作家名录	(263)
附录二 1978—2013年西方部分经典童话中译本 一览表	(267)
后记	(296)

绪 论

.....

什么是童话？童话何时产生？童话何时进入国人的视野？中国童话的发展与西方童话的关系几何？为什么？

.....

如今，当我们谈起童话时，大多数人最自然、最直接的联想，恐怕就是《白雪公主》《小红帽》《丑小鸭》《皇帝的新装》《快乐王子》《爱丽斯漫游奇境》《大林和小林》等优秀作品，是格林兄弟、安徒生、王尔德、卡洛尔、林格伦、张天翼等杰出作家，或者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这样的经典开篇；而童话研究领域里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第一反应则或者是“fairy tale”、“folklore”、“fantasy story”、“kindermärchen”（德语），“Eventyr”（丹麦语）等这些西语单词，或者是“永久的老孩子”“爱的礼物”等饱含着异域风味的理论术语。这两种反应看似并无关联，但其内在的思路实则是惊人一致的，即：无论我们是在笼统地谈论童话，还是专门地评析中国童话，都无法回避西方童话，尤其是西方经典童话对我们的巨大影响。

事实上，无论中外，以儿童为主要接受对象，“驰骋想象，将神奇因素引入普通民众生活，编织闪耀奇光异彩的美妙故事”^① 的民间童话尽管古已有之，但一直有其实而无其名；基本对应于英语单词“fairy tale”且作为学术概念的“童话”一词，其含义主要是

^① 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 页。

指由作家创作的童话作品，它并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产生，而是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美国学者齐普斯即明确指出：“童话（Fairy Tale）指的是由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产阶级或贵族阶级作家改编创作的文学故事类型。……‘童话故事’这个词语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出现在人类的语言当中的。”^①而中国学者舒伟先生则进一步指出：“自从17世纪下半叶一群法国女童话作家把她们的故事称为‘仙女故事’或‘童话故事’之后，这个名称就在法国流行开来，并通过英译文Fairy Tale走向欧洲和世界。”^②此后的19世纪，在席卷欧洲的工业革命和浪漫主义思潮等因素的影响下，搜集和整理童话、创作并研究童话在欧洲蔚然成风，以童话为主体的儿童文学学科也逐渐独立。大量涌现的优秀童话作品及相关研究，使得人们对“童话”的认识与理解更为细致和深入，童话被细分为民间童话和艺术童话^③（也称文学童话、作家童话、创作童话），二者分别以《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为最杰出的代表。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的童话创作与研究因其雄厚的底蕴而又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至今未歇。

20世纪初，中国文学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在“西风东渐”及文学革命的大背景下，热切地以翻译、改写、评介等种种方式，将大量的西方童话作品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儿童教育观、儿童文学观等理论资源引入国内，使得中国的儿童文学学科在短短的一二十年的时间内就迅速形成，并出现了理论领先于创作的独特格局。在周作人、赵景深、郑振铎、茅盾等中国第一批童话研究者的笔下，安徒

① [美]杰克·齐普斯：《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舒伟等译，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② 舒伟：《走进童话奇境——中西童话文学新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③ 在中文语境中，“艺术童话”一词最早见于周作人发表于1913年11月《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2号的《童话略论》一文。文中，周作人把“艺术童话（或人为童话）”作为“民间童话（或天然童话、民族童话）”的对举概念，他说：“天然童话亦称民族童话，其对则有人为童话，亦言艺术童话也。天然童话者，自然而成，具种人之特色，人为童话则由文人著作，具其个人之特色，适于年长之儿童。”后来的学者也把“艺术童话”称为“作家童话”“文学童话”“创作童话”等。

生、格林兄弟、王尔德、卡洛尔等童话作家是他们最为赞赏的对象。同时，以叶圣陶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童话作家几乎很少有人不受外国童话影响的。……正是在外国童话尤其是安徒生童话的启示与影响之下，才使我国儿童文学出现了‘艺术童话’这一崭新的文体，并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童话创作的作家队伍”。^① 其实，不仅是在现代文学时期，就是在迄今为止的整个中国童话发展史上，西方童话对中国童话的影响都是无比深刻和巨大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其影响的表现方式和侧重点各有不同。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童话与西方童话的联系越紧密则发展越健康，越疏远则发展越困难。

但是，对于一个如此明显和重要的现象，我国学术界给予的关注与研究却是比较欠缺的。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儿童文学学科在我国的学科门类体系中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尴尬和边缘的地位，如同“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一样，它也通常被勉强地归置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之下，这势必会造成儿童文学研究人才和研究资源的短缺；其二，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儿童文学学界与西方学界的联系大为减弱，致使中西童话的接受和比较研究缺乏良好的持续发展状态。这种状况到了新时期虽然已有明显的改善，但较之于“文学”门类下的其他学科，儿童文学研究界无论是在对西方学术资源的吸纳借鉴方面，还是在中西童话比较研究的体系建设等方面，都较为薄弱。对此，王泉根先生曾有这样的总结：“由于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既精通外语又具有精深儿童文学素养的专门人才——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很少与国外交流，长期以来几乎是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特立独行，自说自话。”^②

^① 王泉根：《论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浙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 3 期。

^② 王泉根：《童话研究的新成果》，《文艺报》2007 年 4 月 14 日第 4 版。

时至今日，注目于西方童话对中国童话的影响以及中西方童话比较的研究成果总体上依然不甚乐观，以出版的学术专著为例，突出的成果也仅有李红叶的《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舒伟的《走进童话奇境——中西童话文学新论》等有限的几种，因而尚有大量的学术空间有待开拓。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术界对此状况是满意的，恰恰相反，许多学者都已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外儿童文学比较与接受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方卫平先生在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特征时就指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构中的外来学术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理论现象。……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理论问题的清理，都与如何认识这些外来影响有关。因此，如何准确地描述和科学地阐述、评价这些影响的过程和作用，是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关键性课题之一。”^① 韦苇先生也一方面非常肯定地认为“外国童话是一个足够大的借鉴领域”，“从外国儿童文学史入手是研究儿童文学的明智之举”^②，另一方面则是颇为动情地提出了“中国儿童文学师夷说”，向翻译界和学术界呼吁“我们赶快‘师夷’，我们赶快‘借西风’”^③。因此，我们认为，在身处“改革开放”和“与世界接轨”的时代语境中，在中国童话和儿童文学已有百年发展历史且已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和问题的背景下，无论是阐释中国童话的发生、发展机制，还是分析童话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意义，无论是总结童话既往的得失以及评价具体的童话作家与作品，还是直面当今纷杂热闹的创作现状并探索中国童话前进的方向，等等，这些问题要想得到较好的解决，就必须充分了解和重视西方童话对中国童话的深刻影响。

① 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② 韦苇：《外国儿童文学发展史》，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版，“导论”第14页、第3页。

③ 韦苇：《中国儿童文学师夷说》，《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第一节 外来影响与中国童话的发展

童话是儿童文学体系中的大宗，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童话的历史构成了一部儿童文学的历史”。^①但无论是儿童文学学科的自觉，还是“童话”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出现及流行，都是在外国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同类作品与理论的启示下达成的。^②而且，从20世纪初直至今日，尽管苏联童话、日本童话也在某些时候被大量地引入中国并产生了极大影响，但总体来看，西方童话无论是在中译本的质与量方面，还是在影响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中国童话、中国儿童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西方童话的影响密不可分的。具体而言，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就文学观念而言，西方童话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童话和儿童文学的概念以及其中所蕴涵的现代的儿童观念。这种来自西方的启示与滋养，不仅促使了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学科的诞生，而且对整个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般而言，“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端于‘五四’时期”。^③但胡从经先生则认为应将这个时间节点往前推至晚清：“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如同繁星璀璨的夜空，呈现了一片绚烂多彩的景象。……中国近代许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都曾留心于儿童文学事业，为中国儿童文学史写下了光耀夺目的一章。”^④而无论是“晚清说”还是“五四说”，都不否认来自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巨大影响，毕竟西方

① 方卫平语。见梅子涵等《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新蕾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② “童话”一词虽转借自日语，但其真正的源头实来自欧洲。周作人、赵景深等人在讨论童话的内涵与特征时，都是将其与德语 *Märchen* 或英语 *fairy tale* 相对应的，而他们所列举的童话范本也大多是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参见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版。

③ 蒋风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④ 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版，“小引”第2页。